

静|一|述|林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 之九
总主编 傅勇林

跨学界比较实践

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

Ding Ling Studies in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hip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任显楷◎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静 | 一 | 述 | 林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 之九
总主编 傅勇林

跨学界比较实践

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

Ding Ling Studies in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hip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任显楷◎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学界比较实践：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任显楷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11-3046-5

I. ①跨… II. ①任… III. ①丁玲 (1904~1986)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3425 号

Kuaxuejie Bijiao Shijian

跨学界比较实践

Zhongmei Xuejie De Dingling Yanjiu

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

任显楷 著

责任编辑 邱季生 (972697377@qq.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41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46-5
定 价 3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总序

傅勇林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而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

“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甄别，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

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建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啻“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

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同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目 录

总序	傅勇林 001
绪论 探索丁玲研究的三种途径：历史叙述、意识形态批评与性别批判	001
第一章 丁玲创作及中美学界丁玲研究概况	028
第一节 丁玲创作分期	028
第二节 中美学界丁玲研究概况	043
第二章 事实与叙述：中美学界历史视角下的丁玲研究	055
第一节 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的分类与分期	056
第二节 时代政治图景下的个人叙述：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 第一次高峰	069
第三节 丁玲历史叙述规范化的开始：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 第二次高峰	096
第四节 历史还原与个人意识：中美学界丁玲历史叙述第三次高峰	116

第三章 文学家或政治家：中美学界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丁玲研究 ·····	139
第一节 从个性解放到阶级批判：新时期前中国学界丁玲研究·····	142
第二节 艺术性与道德感：美国学界起步阶段的丁玲研究·····	165
第三节 从平反到重写：新时期中国学界丁玲研究·····	179
第四节 意识形态与叙述：美国学界转折阶段的丁玲研究·····	196
第四章 “女”作家的困境：中美学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丁玲研究 ·····	214
第一节 背景与对象：丁玲研究的女性叙述话语·····	217
第二节 从“Modern Girl”到“女烈士”：女性主体意识的消隐 ·····	228
第三节 贞贞和陆萍：女性主体意识的抗争·····	252
第四节 中美学界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丁玲的全面反思·····	268
结论 丁玲研究跨学界比较的意义 ·····	296
参考文献 ·····	302
后 记 ·····	315

绪论

探索丁玲研究的三种途径： 历史叙述、意识形态批评与性别批判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①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女性作家。除了没有亲历五四运动及 1990 年代的文化转型之外，她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全部风云变幻。这使得丁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少有的人生及创作同时代特征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女性作家。从丁玲进入文坛之时，我国对她的评论就开始出现，其后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丁玲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我国学界的丁玲批评极大地影响了丁玲的创作活动。这使得中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同作家的创作之间形成交互性的特征。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属于西方汉学研究的范畴。对现代中国诸问题的关注，使西方传统汉学（Sinology）演进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如丁玲的

① 在中文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狭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即从 1917 年中国新文学发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内的文学成绩。广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个宽泛的用法，将 1949 年之后的中国文学一并纳入进来。而后者在严格的意义上则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因此，有时候为了通称新文学以来的中国文学，也采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提法。在本书中，宽泛指称的情形下一律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为了让英文语境中的术语同其中文翻译相匹配。在英文语境中，有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和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两个术语。在将这两个英文术语翻译成中文时，本书将前者处理为“中国现代文学”，后者处理为“中国当代文学”。但需要注意的是，英文语境中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时间分期同中文语境下的并不相同，并且有时候在用法上有时间相互重叠的情况，所以这样的翻译仅仅是做到了字面上的一致而已。

考察，正是这一题域中的重要内容。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也已形成丰硕成果。由于研究立场、思想方法的不同，美国学界的研究并不介入作家的具体创作。作为一种异域的视角，相对而言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客观性与超越性的特征。本书以中国学界和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为对象，是对研究的再研究。丁玲研究的本质是一种知识建构。通过考察该知识体系中的所选内容、话语方式以及理论方法，将能够探索出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影响这种知识建构的权力关系。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是在不同权力关系下形成的两种知识体系，两相参照将能够更好地凸现各自知识建构中的问题。这亦成为本书采取比较式研究的根据。从另一个角度看，将中美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并置，亦凸显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跨学界比较”的思路。

依据所采用的方法和对问题强调的侧重，中美学界的丁玲研究大体可以被分别纳入三个板块：对丁玲生平历史进行的传记式研究，从意识形态立场对丁玲创作做出的批评，从性别视角对丁玲问题进行的批判与反思。本书拟从以上三种途径展开对中美学界丁玲研究的观照，通过清理和比较两个学界的研究思路及成果，深化对于丁玲本人和丁玲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一、选题意义与学术价值

丁玲极其丰富的人生历程以及独具特征的写作实绩是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出发点。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丁玲及其创作在多个向度上发生问题，并引起学界的深入研究。

首先，丁玲传奇般的人生历程折射出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原籍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1904 年出生于湖南常德。^① 其母亲蒋胜眉思想开明，^② 受此影响，丁玲自幼接受新式教育，思想进步，并脱离其封建家庭。^③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丁玲时年 15 岁。她在家乡湖南常德积极参加游行、演讲和剪辫子等进步活动。^④ 随

①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2 页。

② 丁玲母亲本姓余，闺名曼贞，后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1878 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丁玲《我母亲的生平》，载《丁玲全集》（第 6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3 页。

③ 丁玲《母亲》，载《丁玲全集》（第 1 卷），前引书，第 218—224 页。

④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载《丁玲全集》（第 6 卷），前引书，第 31—32 页；以及 1978 年 9 月 17 日丁玲致孙女胡延妮的信，载《丁玲全集》（第 11 卷），前引书，第 244—257 页。

后，丁玲经历了一段时间在上海、北京、常德等地的“游学”生活。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丁玲成为秉承了五四自由精神的时代女性。但同时五四退潮之后的时代低气压，也使丁玲的精神陷入了极端苦闷的境地。^①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丁玲逐渐从迷茫中醒过来。^② 她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不少重要作品，成为她写作生涯的开端。^③ 这些作品反映了在五四精神感召下的时代女性，因为思想的进步和自我意识的解放，宣泄对于社会的不满。文学是这时代进步青年普遍选择的武器，丁玲正是在这一潮流下开始成为书写自我意识的女性作家。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由于受现实社会状况和胡也频等亲友的影响，丁玲思想和行动上转向左翼革命。她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④ 并于1932年年底到1933年5月中旬这半年时间里担任左联党团书记。^⑤ 1931年胡也频遇害后，丁玲怀着巨大的悲愤，顶着风险与压力主持编辑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⑥ 1932年3月丁玲通过了入党仪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⑦

- ①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鲁迅先生于我》等。分别载《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31—58页；《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95—301页；《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302—309页；《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105—121页。
- ②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载《丁玲全集》（第9卷），前引书，第60—80页。
- ③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以及《感谢与祝贺——为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作》。分别载《丁玲全集》（第8卷），前引书，第3—12页；《丁玲全集》（第9卷），前引书，第431—432页。
- ④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我的自传》。分别载《丁玲全集》（第9卷），前引书，第60—80页；《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38—244页；《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51—253页。在以上几篇文章中丁玲参加左联的时间为1930年。但在丁玲《自述》一文中为1931年。《自述》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54—255页。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参加左联时间为1930年。该《通知》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01—103页。另很多丁玲传记研究著作也附有丁玲生平年表。在丁言昭的《丁玲年谱简编》中丁玲加入左联时间为1930年，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4—385页。《丁玲年谱长编》亦作1930年，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69页。据此，本书将丁玲加入左联的时间认作1930年。下文皆同。
- ⑤ 丁玲《一点补正》，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45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84页。
- ⑥ 丁玲《死之歌》《回忆潘汉年同志》以及《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分别载《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312—322页；《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206—211页；《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38—244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84页。
- ⑦ 丁玲《入党前后的片断回忆》以及《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分别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46—250页；《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31—58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79页。

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开始发生第一次转变，从最初反映五四退潮后女性的自我意识以及生存焦灼，转而表现工人、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表现无产阶级大众是左翼革命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的这一转变是对左翼文学思想的学习和接受。后者对丁玲创作的批评及希望成为影响丁玲创作变化的现实原因。然而知识分子出身的丁玲对新的题材和领域并不熟悉，一方面她不断地加深对左翼思想的学习和认识，另一方面左翼文化界对她的批评明显地影响了她的创作。从1930年代开始，丁玲逐渐走出一己个人的小天地，踏入了社会政治领域。她的人生及创作由此开始同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发生密切的关联。

1933年5月，丁玲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即被绑赴南京。从此被国民党政府秘密囚禁在南京达三年时间。^① 丁玲于1936年成功出逃南京，赴上海，经西安，最后抵达当时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保安。^② 在这三年时间里，丁玲没有任何文字著述，外界也长期没有她的任何一点消息，一度认为她已被害。南京三年之囚是丁玲人生历程的一次重大转折，不但改变了丁玲人生的走向，而且在今后给丁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苏区，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热烈欢迎，她是第一位从国统区进入苏区的成名作家。^③ 从此开始，她的人生命运将与中国共党政权、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她的作品，亦成为其命运浮沉的记录、时代动荡的见证，连同她本人的经历一起，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一页。

进入延安以后，丁玲在作家之外更兼具了政治家的新身份，在创作之外担任了一系列政治文化职务。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带领西战团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对前线战士进行慰问演出，向国民党军队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④ 西战团是战争时期抗战文艺、

① 参见丁玲《魑魅世界·风雷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86—110页。

② 丁玲《魑魅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回忆潘汉年同志》《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以及《我怎样来到陕北的》。分别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100页；《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206—211页；《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第76—84页；《丁玲全集》（第5卷），前引书，第125—131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110—117页。

③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117页。

④ 丁玲《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287—294页。

宣传文艺的典型代表，以宣传政策、发动人民、配合斗争为特征。通过领导西战团的工作，丁玲的政治身份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也是在延安时期，丁玲出现了一个杂文写作的小高峰，同时还产生了几篇反映延安政权下女性问题的小说。在这些创作中，丁玲以女性为核心的自我意识再度高扬。但是身处不同的现实环境，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并不符合延安文艺方针的要求。在整风运动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丁玲的写作再一次发生了重要转变。^① 经过整风运动的批评，以毛泽东《讲话》精神为指导，丁玲再一次消隐了她的女性个人意识，朝向工农兵文学转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丁玲作为工作组成员积累了大量素材，在此基础上写作出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成为丁玲转向工农兵文学的最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继续担任与文化、文艺相关的行政职务。1950年6月丁玲领导筹备建立中央文学研究所。^② 1951年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并开学，丁玲担任所长。^③ 该年春丁玲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④ 1953年丁玲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⑤ 随后我国对丁玲的批判逐步展开。1954年10月—12月，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连续召开八次联席会议，对丁玲在《文艺报》期间的工作展开了不切实际的批评。^⑥ 1955年8月—9月，中国作家协会一共召开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最后将丁玲、陈企霞定性为“独立王国”、“反党集团”，批判丁玲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和个人崇拜。^⑦ “反右”运动展开后，1957年8月—10月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丁玲及其作品的文章。^⑧

① 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于5月2日的开幕式上致开幕词，5月23日致闭幕词。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经过整理后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再次收入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对一些字句提法和部分内容作了修改。本书中所使用的该文献版本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前引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②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264页。

③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272页。

④ 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276页。

⑤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306页。

⑥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319—321页。

⑦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333—343页。

⑧ 参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7日头版《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文艺报》1957年8月11日头版《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373—401页。

最后在1958年初的“再批判”高潮中以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总结。^①最终，丁玲被定为“反党分子”，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和级别，与其丈夫陈明先后被下放到黑龙江北大荒落户劳动。^②1966年“文革”爆发后丁玲受到批斗、殴打，并被关进“牛棚”，吃尽苦头。^③1970年4月北京军管会将丁玲、陈明同时逮捕，分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单人牢房。^④直到1975年5月，丁玲、陈明才被宣布释放出狱，安置在山西长治老顶山嶂头村定居。^⑤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5年最终恢复自由，丁玲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经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动荡与波折。政治对丁玲文艺创作的影响非常明显。从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丁玲行政工作繁忙，除了一些因现实生活有感而发的散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家的个人情怀外，其他的大都是一些应景的讲话、发言或评论。这些文章发表于特定场合，指向明确，政策性强于思想性。但就是这一时期，丁玲也并没有放弃个人的文学创作。早在1947年丁玲就开始构思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另一部反映农村土地斗争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⑥该作动笔于1954年夏天，但由于随后几年的政治冲击终未卒章。而丁玲始终对这部小说寄予希望。^⑦在1958年下放劳动时丁玲还不断对这部作品进行思考、推敲，并继续写出5万字，但这些文稿在“文革”中全部丢失。1975年丁玲被释放后，从1976年3月—1978年3月在长治重写该作品，完成24章共12万字，发表于1979年的《清明》创刊号。^⑧

① 周扬文，参见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及3月11日《文艺报》。以及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前引书，第89—144页。陈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91页。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404页。

② 参见丁玲《魑魅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404—414页。

③ 参见丁玲《魑魅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前引书。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445—456页。

④ 参见丁玲《魑魅世界·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前引书。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457页。

⑤ 陈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以及《记入狱》，均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91页以及第207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459页。

⑥ 蒋祖林、李灵源《我的母亲丁玲》，前引书，第109页。

⑦ 丁玲《风雪人间》，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19页。

⑧ 编者《在严寒的日子里·编者按》，载《丁玲全集》（第2卷），前引书，第315页。

但直到丁玲去世，这部小说也没有能够完篇。身处动荡时代，作为作家的文学梦想与作为政治人物的跌宕命运，同时体现在丁玲这部始终难以卒篇的小说上。而在1957年—1979年之间，丁玲没有任何一点文字见诸报端。在长达20多年的岁月里，丁玲的文学活动全面中辍。

丁玲在1970年代末复出。在其一生最后的七年中，丁玲又恢复了她的作家本色，笔耕不辍；而她一度中断的政治生命也再度得到了延续。1979年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作出结论，摘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帽子，撤销丁玲“右派”身份，恢复其党籍。^①1979年，丁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②同年10月，丁玲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副主席。^③1980年初，党中央批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意见，恢复其党籍和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84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至此，丁玲所有的历史问题及不白之冤乃得以最终平反。^④1981年8月至年底，丁玲以近八十岁的高龄，应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之邀赴美访问。^⑤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⑥在最后的七年中，丁玲写作了数量颇为可观的文章，并且还主持出版了大型文学杂志《中国》，其文学活动再度显示出一个高峰。这期间丁玲写作的许多珍贵的回忆性文字成为她一生为人、为文的见证与总结。但同时，丁玲晚年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言论再次为她带来了新的麻烦。在新时期社会思想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丁玲的很多言行显得“不合时宜”，而陷入文坛人事纷争更是让人们对她议论纷纷。在这种褒贬毁誉之间，丁玲走完了人生的全部历程。

纵观丁玲的一生，她的文学生命与政治生命紧密连在一起，无法分割。作

① 陈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98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527—529页。

②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537页。

③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548—551页。

④ 丁玲《翘翘世界》附录，载《丁玲全集》(第10卷)，前引书，第101页。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731—733页。

⑤ 参见丁玲《向昨天的飞行》等，载《丁玲全集》(第6卷)，前引书。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596—609页。

⑥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前引书，第833页。

家与政治家两种身份集中在一个女性身上，二者形成了复杂的张力。丁玲是一个非常具有天分的女作家，在时代的感召下，她的早期创作成为一代女性的心灵呼声。性别的敏感使她能够始终抓住不同历史条件下女性心底深处的挣扎，并诉诸笔墨。但同时，丁玲的文学创作又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同社会现实以及意识形态发生了关系。1930年代丁玲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加入左翼文学阵营，自觉接受和实践新的文艺思想。进入延安之后，丁玲的女性意识同延安文艺政策发生了矛盾，但最终朝向后者靠拢。从这以后，丁玲的政治家身份表现得越来越鲜明，其写作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丁玲由文艺创作上的优异表现进入政治领域，但政治却逐渐对她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侵蚀。在政治体制中，丁玲一度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荣誉。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她在文学与人生两方面又都遭受到极大的损害。丁玲一生挣扎于个人意识、文学追求和政治责任之间，其女性性别更加重了这种挣扎的复杂与吊诡。丁玲人生与创作所显示出来的种种问题代表性地折射出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命运、国族的现代想象以及女性的生存悖论等更为核心的问题。从丁玲这样一个代表性的作家入手，学界对于丁玲的讨论不但揭示出丁玲本人在上述题旨内的意义，同时学界的研究也构成上述问题的一部分。本书以中美学界丁玲研究为对象，就是希望对该研究本身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作出观照。

其次，作为研究的再研究，本书是对中美学界丁玲研究的一次清理和总结。

我国学界对自身丁玲研究的清理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中国学界对丁玲最早的评论在1930年代伴随着作家的创作一同产生。这一类评论随着作家创作的持续前进，也不断地保持发展，产生出许多及时且针对性很强的时评文章。由于是丁玲研究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很少长篇幅的研究专著，大都是首先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单篇论文。因此，对这类单篇论文进行归纳和结集就成为学界整理丁玲研究成果的最早努力。1930年代这类重要的论文汇编集有张惟夫辑录的《关于丁玲女士》（北京立达书局，1933年），其中有当时著名国画家王森然先生的序言及补言、丁玲简传及大事年表，以及评论界对丁玲的重要讨论近十篇。张白云编辑的《丁玲评传》（上海春光书店，1934年），收录丁玲著作编目以及贺玉波、钱谦吾、茅盾、方英等评论家写作的18篇论文。这是当时收录讨论丁玲文章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部文集。除了这类专门的对丁玲研究文章进行辑录的文集外，一些其他类别的文集也收录了少量丁玲研究文

章。如黄人影编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收方英的《丁玲论》，谛山、肖石、殷干的《一个时代的烙印》。姚蓬子编的《丁玲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收他本人的《我们的朋友丁玲》，冯雪峰署名何丹仁的《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茅盾的《女作家丁玲》以及钱谦吾的《关于〈母亲〉》。徐沉泗、叶忘忧编选的《丁玲选集》（万象书屋，1936年）在上述四位评论家文章之外，再收钱谦吾的《丁玲》和杨邨人的《丁玲的〈夜会〉》。这些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对同时期的丁玲创作的品评，涵盖了丁玲被捕南京以前的重要作品。

抗战以后丁玲身在延安。由于战争的阻隔，国统区文化界相对而言较难了解她的情况，因此讨论也不太多，而根据地内部由于以民族抗战为中心，并未有意识地对有关丁玲的评论文章进行总结。在这样的情况下，193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有针对性地收集研究丁玲文章的著作并不多。所能看到的仅如天行编的《丁玲在西北》（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收录四篇介绍丁玲根据地工作的文章；《丁玲杰作选》（白光书店，1937年），收录白云的《丁玲传》和方英的《丁玲论》；《西线生活》（生活书店，1939年）收录史轮的《丁玲同志》。应该看到，由于战争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学界对丁玲的研究本身不可能充分和系统，很多文章往往也都以介绍性的内容为主，因此对这些研究的收集整理就更为零散和粗疏。

新中国成立后到“反右”运动前，学界对丁玲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几部现代文学史中。但这些著作以丁玲本人及其作品为对象，并未总结此前研究丁玲的相关成果。“反右”运动开始后，产生过几部辑录丁玲“研究”文章的文集。但收入其中的均是运动中对丁玲展开批判的文章。这种文集的目的本不在于对这一时期的丁玲“研究”进行总结，而是为了集中批判的火力。这类文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这不是一本专门辑录批判丁玲文章的集子，但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针对的是丁玲。类似的还有影响更大的《文艺报》编辑部编的《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

19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的丁玲研究走上了新的道路。新时期之初，为配合对丁玲的拨乱反正，全面总结过去丁玲研究的情况、厘清过去对丁玲的评价和各种意见是达到拨乱反正目的的有效手段。在这种要求下，袁良骏的《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应运而生。这部著作是《中国

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一种。其编选思路非常明确：“力求比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以应科研和教学工作需要。”^①袁良骏是我国学界丁玲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这部《丁玲研究资料》收录了涉及丁玲生平的重要文章、丁玲谈论自己创作的相关作品以及最重要的丁玲研究论文选编。后者以新中国成立分期，以内地和港台、海外分界，收录了从1929—1981年中国学界重要的丁玲研究文献，全面地反映出研究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学者的各种观点。另外，该书所附丁玲著作年表和目录、丁玲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都是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由于袁良骏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截至当时中国学界丁玲研究的整体面貌，突出了这一研究版图中重要的研究成果，勾勒出研究发展的整体脉络，故这一著作直到今天也还是学界丁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丁玲研究资料》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从这部著作之后，我国学界对丁玲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同类型著作再也没有出现。从拨乱反正以来，中国学界的丁玲研究发展迅速，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产生了异常丰富和侧重各异的研究成果。与这种研究的极大丰富相比，对研究本身进行的总结却几乎没有。面对新时期以来纷繁驳杂，从理论方法到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研究态势，没有作出有效的清理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袁良骏的《丁玲研究资料》在时间范围上只收录到1981年。从此之后的研究成果亟待总结。

从1920年代末至今，在近八十年的讨论中，我国学界对丁玲的基本问题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认识。在新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今天人们的兴趣开始发生转向，这使得丁玲研究度过了高潮期，呈现为一个缓步发展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总结学界此前丁玲研究的成果，清理其中合理的成分，乃至在新的方法下揭示丁玲研究作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过程，就不但是可行而且是应该的了。

对于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来讲，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也就是说，美国学界的丁玲研究本身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和总结。美国学界对丁玲的研究属于其“中国研究”门类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从美国“中国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夏志清（C. T. 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① 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丛书例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